

主编 严连生
副主编 吕军

风范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著名专家传略（卷一）

齐鲁书社

风范

薪传火旺，继往开来，齐鲁医院之所以在历史上曾享“南有湘雅，北有齐鲁”的盛名，在今天有众望所归的声誉，都是齐鲁医院几代人辛勤耕耘的结果。或穷经皓首为医学进步终其一生，或忍辱负重为信念实现而矢志不渝，或以救死扶伤的品格书写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或以精益求精的医术赢得患者真诚的拥戴……本书文字所录入的人和事只不过是灿烂天际中的点滴星光，洋洋大河中的几朵浪花，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大医风范尽在其中了。



風範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著名专家传略（卷二）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范/严连生,吕军主编.-济南:齐鲁书社,2007.12

ISBN 978-7-5333-1948-9

I.风… II.①严… ②吕… III.医生-生平事迹-山东省
IV.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805 号

主编 严连生 副主编 吕 军

出版发行:齐鲁书社

社 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qlss@sdpress.com.cn

印 刷: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30.5

字 数:562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33-1948-9

定 价:86.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风范》编委会

主任委员：周日光 魏奉才

副主任委员：毕玉平 车学洪 陈晓阳 韩培祯
高海青 刘云川 李新钢 孔北华
刘玉欣 刘建国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孔北华	王守勇	王西珍	车学洪	牛梅莲
丛雅琴	刘云川	刘玉欣	刘 庆	刘国卿
刘建国	毕玉平	吕 军	纪李亚	纪春岩
孙放鸣	张万民	张 豪	杨丕稳	杨 敏
苏 华	严连生	李 波	李敦军	李新钢
陈晓阳	周日光	赵 伟	郭建平	郭 媛
高海青	徐 萍	阎 明	曹秀玲	梁临平
梁爱菊	黄晓燕	谢 力	韩培祯	潘文英
魏奉才				

主 编：严连生

副主编：吕 军

责 编：杨孜孜 田玉清 谢 静 栾秀梅

摄 影：朱 明

序

绵延悠远的历史长河,承载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艘背负过艰难、收获、希望的航船,行驶了118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齐鲁医院以其丰厚的历史积淀、严谨的科学学风、博大的人文精神,培养出了一代代一批批德艺双馨的名医。他们有的如璀璨的明星般光彩照人,有的如修行于医学殿堂的信徒虔诚笃定。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学历显赫,有的自学成才,但“治病救人”的共同信念和理想使他们走进了齐鲁医院。他们把青春和热血溶入了齐鲁医院发展与进步的每一座里程碑。他们用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扫除了无数患者身心的阴霾,在神圣的医学沃土上尽情地播洒着生命的希望。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这是希腊伟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这是唐代名医孙思邈对大医的一种的理解或评价或自我追求。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从医者,遵奉着“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的理念,把救死扶伤、济世救人作为自己职业的终生追求,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了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倾其一生,呕心沥血。本书所记齐鲁医院名医,正是一代代白衣天使的一个缩影。

回首历史,齐鲁医院的名医大师中有的已经成为蜚声中外的医学泰斗,有的正在向新的高度攀登,有的已经辛劳作古,有的仍然伏枥于事业的发展。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名誉有加;也有不少人曾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忍辱负重却奋斗不息。但是无论何种境遇,他们从不言放弃,从不求索取,奉献是他们一生惟一的追求。正是他们的高风亮节令我们高山仰止、钦佩不已。正是他们所开创所孕育的医院精神,使一代代齐鲁人薪火相传,生生不已!

我个人认为,在自然界的循环轮回中,在宇宙自身运行规律中,再前

锋的技术有时也会淘汰,再先进的设备,有时也会落伍。而唯有创造这些技术、设备的人,人的思想精神,却会历久弥新,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更弥足珍贵!

在新旧交替、社会价值多元并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充分挖掘和弘扬名医大师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勉励医务工作者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对于促进山东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以人物传记形式集中推出的齐鲁医院 70 余位名医大师的《风范》出版,可喜可贺,记以上感想,是为序。



2008 年 5 月 20 日

目 录

没有大学文凭的大学教授	
——记实验诊断学科教授于复新	1
中国病理学先驱——侯宝璋	8
可消灭的疾病 不可遗忘的人	
——记皮肤科教授尤家骏	14
从“娃娃号兵”到针灸名医	
——记针灸推拿科教授郑毓桂	20
行走在历史深处的医学大师	
——记血液病、传染病学教授高学勤	27
赵常林:只要病人需要,我都愿意去做	37
孙鸿泉:精诚大医	43
在故土上播撒光明的使者	
——记眼科教授孙桂毓	49
行医济世 毕生追求	
——记神经科教授朱汉英	55
逝者长已矣 生者当勉励	
——记内分泌科教授周显腾	61
医生要有一颗菩萨心	
——记口腔颌面外科教授孙涌泉	67
名利于我如浮云	
——记骨科教授张学义	73
为了跳动的心	
——记著名心血管外科教授张振湘	82
足行万里书万卷 一生临证未曾闲	
——记中医教授肖珙	88
夕阳无限好 伏枥耕耘忙	
——记儿科教授傅曾矩	95
千磨万砺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记妇产科专家陈希夷	101

音容宛在 浩气犹存	
——谨以此文纪念彭怀正同志	106
张学衡:医生的责任重于泰山	109
要对得起热爱的事业	
——记耳鼻喉科专家王天铎	115
在平凡中闪光	
——记神经内科教授高雁	121
书要教透 病要看好 心要放宽	
——记普外科教授李兆亭	126
让明天的太阳更灿烂	
——记小儿内科教授张孝中	132
伏枥志岂止千里	
——记妇产科教授江森	137
从“拉药匣子的”到一代大医	
——记中医教授李明堂	143
许身国策平生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	
——记妇产科计划生育专业创始人丁声玲教授	149
红烛之歌	
——记诊断学教授戚仁铎	155
历史的天空拒绝尘封	
——记皮肤病医学教授韩丹铨	162
张遵瑛:我本来就是名普通医生	172
胡圣光:一切为了病人着想	177
忘己爱苍生	
——记病理学专家乔柏生	183
护心使者	
——记心内科教授徐庆来	189
黑暗中送去光明 模糊中带来希望	
——记青光眼专家教授魏美恩	194
用心呵护生命	
——记心内科教授高德恩	200
大医成佛	
——记骨外科教授王永惕	206
天职	
——记神经外科教授张成	217

做个好医生,苦中求乐	
——记普外科教授胡继康	223
踏遍青山人未老	
——记中西医结合教授陈克忠	229
杏林春暖苍生心	
——记神经内科教授李大年	234
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记神经外科创始人何守俭	240
做一个不掉队的卫生兵	
——记血液病学教授张茂宏	246
钟情麻醉五十载 甘为人梯乐助人	
——记麻醉医学专家应诗达教授	252
影像传奇	
——记影像医学放射科华伯坝教授	258
平凡的高尚者	
——记血液学教授张明珙	264
做病人心中的好医生	
——记泌尿外科教授元天伟	272
郎中寿楠海	279
医技世人称颂 医德无愧天地	
——记消化内科奠基人赵宪邨教授	285
为有仁爱酬壮志 勇驱病魔换心田	
——记心外科教授宋惠民	291
于秀浚:在眼睛上跳舞	300
吸收大医精髓 消化医学真谛	
——记消化病内科教授袁孟彪	307
只留清气满乾坤	
——记“中国人工喉”发明者杨仁中	313
医学海洋勤实践 脐血荒漠觅珍宝	
——记儿内科教授沈柏均	323
张庆林:用良心行医	329
活到老,学到老	
——记普外科教授王占民	335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记妇产科教授戴昱笙	341

胸怀一颗感恩的心

——记胸外科教授王善政348

用忠诚写就中医辉煌

——记中医科教授李莱田354

“他是我们的定心丸”

——记泌尿外科教授郑宝钟364

鲍修风：“一把刀”手中无刀370

张尚忠：一切为了病人着想377

扼住生命的咽喉

——记耳鼻咽喉科教授栾信庸383

心中有爱 仁术在身

——记心内科教授潘其兴389

圣殿守望者

——记小儿外科教授陈雨历395

宛如平常一首歌

——记普通外科教授姜希宏404

大爱无言

——记心血管外科教授李守先412

医海珠贝

——记骨科教授汤继文418

德艺双馨医师楷模

——记神经外科教授吴承远426

优秀的学术专家 可敬的苍生大医

——记普通外科教授李占元432

显微镜里的大世界

——记内科血液病专家潘祥林438

孙靖中：为了一个医生的责任445

陈瑛：医学探索永无止境451

书写无悔的人生

——记肿瘤中心教授徐从高458

牵动山东儿科的神经

——记小儿神经内科教授孙若鹏467

医学王国“追梦人”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心内科教授张运473

没有大学文凭的大学教授

——记实验诊断学科教授于复新

人物简介 于复新，字铭三，1890年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一家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911年经人介绍，到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称共合医院）化验室当练习生，边工作边学习，因在实验技术上有发明创造和多部专著，先后被提升为化验室主任，技士专修科主任，1946年被齐鲁大学医学院聘为临床细菌学教授。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齐鲁医院要南迁福州，于教授毅然留在济南迎接解放。1952年院系调整后，齐大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他不再当医院化验室主任，成为山东医学院实验诊断学科教授。1960年于教授光荣退休，但他仍然义务担任山医附院化验室的技术指导，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才被迫停止工作。在“文革”时期他已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但得不到休息和治疗，并遭受“四人帮”爪牙的迫害，不幸于1969年1月21日病逝，终年79岁。



于复新夫妇金婚留影

自学成才 堪称楷模

于氏家境贫寒，8岁时因患猩红热病高烧得不到应有治疗，病虽然勉强治好了，却留下了两耳重听的毛病。他12岁时才有机会入私塾就读，14岁又转入教会小学学习，17岁时因生计所迫辍学两年，去潍县打工谋生，以后又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完成中断了的教会中学学业。在济宁教会中学勤工俭学时，他常到美国牧师田发起

(Dr.Field)家中干些勤杂工作,由于他为人厚道,干活勤恳,工作认真,学习成绩好,很受田牧师的器重,于1911年田牧师推荐他到济南共合医道学堂(齐鲁大学医学院前身)的共合医院工作。他到职后,因两耳重听难以听诊,当时的老师们认为,与其让他当一名不合格的医生,倒不如让他做一名优秀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于是医院让他当了化验练习生,从刷试管等基本功开始,踏入了医学检验的门坎。在二十世纪初叶,我国的临床检验事业才刚刚起步,国内只有少数医院设有化验室,且多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工作。因为实验诊断学是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现代科学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生学科,他两耳失聪,当时中文专业资料又奇缺,他文化水平较低,这些便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但这些并没有难倒他。为了掌握实验诊断这门先进技术,他把家务琐事托付给了妻子,自己则全力投身于工作和学习上。他每天坚持跑步上班,借以锻炼身体,中午不回家吃饭,随身带着窝头,饿了就啃上几口,工作、学习连轴转,以勤补拙,以俭养廉,不断积累知识,提高业务水平。经过多年的艰苦自学和选课进修,他不但有了高超的检验技术,还有发明创造。在工作中养成了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勤俭朴实的优良品德,成为病人最信得过的检验工作者。

众所周知,在化验工作中致病性和非致病性阿米巴的鉴别是很难掌握的技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痢疾阿米巴病又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只有依靠化验才能明确诊断。于氏曾被派往北京协和医院化验室专门学习过原虫检查,得到过真传,但他仍感到对五种变形虫的鉴别上不够明确,不易掌握。为此他常对一份阳性粪便标本连续观察4-5小时,多方比较。经过他多年的努力,取得了辨认五种变形虫的要领,总结成鉴别要点,写在了他的专著中。于教授不仅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连他在海关做检疫工作的学生,也多次纠正了外国检验人员的错误,在检验界中传为佳话。

该院同事尤家骏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麻风病专家,而他的一些病理标本及涂片检查,则得力于于教授。于氏对于麻风病人态度和蔼,不摆架子,不怕脏,有耐心,和一些老病号成了好朋友。1953年,于教授曾带领我们学科的十几位小青年,去西郊麻风病院参观,许多老病号都认识于教授,于教授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他们之间互致问候,欢声笑语的融洽关系十分感人。为了确定或排除一名麻风病患者,他常常为一名就诊者做十几次检查,查几十张片子以明究竟。因为一旦确诊为麻风病,就像对病人判了无期徒刑或死刑,被隔离到麻风病院或麻风村长期强制治疗,以防传染别人,所以必须十分慎重。可以说他对检验工作真正做到了“完全”和“彻底”,因此病人及其家属都对他感恩戴德。由于他多年来对麻风病防治研究的卓越贡献,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聘为济南市麻风病院的董事长。

1917年到1918年山西流行鼠疫。该处有一警察为了躲避瘟疫,离开山西返回济南老家,但他到家后很快就病故了,周围群众并不知其死因。此后在该大杂院里便接二连三地死人,人们认为是“闹鬼”,一时间人心惶惶,纷纷往外搬迁,瘟疫也迅速蔓延开来。那时有一患者到齐大医院就诊,于老在该病人身上培养出了鼠疫杆菌,又从刚埋葬的尸体中培养出鼠疫杆菌。当时虽无治疗鼠疫病的特效药,但由于疫情的及时发现,使当局及时采取了隔离患者的措施,所以济南市的这次鼠疫之灾,只死了150多人便控制住了鼠疫的流行。

于教授在医学检验方面是博学多才的,除以上所述外,他在诸如黑热病、结核病、疟疾、法医检验等方面都有独创经验和很高造诣。例如,解放前常有标本送给于老,要求鉴定污迹是否血迹,是人血还是哪种动物的血。一次法院送来一份标本,被告为一男性农民,因他裤子上有血而被控为杀人犯。被告辩解说“在逃难时慌乱之间错穿了女儿的裤子,该血是月经血”。于老用盐水将血迹洗下,离心后在其沉渣中找到了一些鳞状上皮细胞,证明此血确系月经血,法院遂据此判定被告无罪。当时,这种鉴定月经血的方法是书本上没有的。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齐鲁大学及其医院。原齐大医院人员大多到济南市立医院去了,但实验动物还在齐大医院内。于老等人借喂动物的机会,冒着危险,瞒着日兵岗哨,陆续取出了一些化验器材。至于实验动物,日兵只给了8只荷兰猪,却全是雌性。朋友又冒险取出一只雄性荷兰猪交给于老。于老把这9只荷兰猪放在自己家里亲自喂养,使他们繁殖了后代,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由于于老的人品、才学非常出众,因此齐大徐伟烈教授等人,于1946年向齐大医学院联名推荐,先生被院方破格聘为临床细菌学教授。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贫家儿子,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超群的工作热忱和高尚的品德,在外国人主办的名牌大学里被提升为正教授,这在我国医学检验界中是绝无仅有的。于教授自学成才的光辉榜样,激励了我国不少检验界的后来人,这在巩固和提高我国检验队伍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于氏试验 名扬医坛

在旧中国,梅毒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它严重地危害着人民健康,在大城市尤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确诊此病的最先进的检查方法为梅毒血清反应-康(Kahn)氏和瓦(Wassemann)氏反应。这两种试验法各有优缺点:瓦氏反应的准确率高,为98.3%,但操作复杂,出结果需等一天以上,且可因抗补体因素的出现而不能判定结

果;康氏反应的准确度较低,为 94.3%,且易出现假阳性,操作也较复杂,因此人们渴望有一种简易而又可靠的梅毒血清试验法。

于教授在 1921 年发明了一种新的梅毒血清试验法,他本人称其为“梅毒血清环状沉淀试验法”(国内同仁则称之为“于氏试验”)。“于氏试验”经过 2000 多份血清的对照观察,证实该法操作简单,便于推广,正确率为 97%左右,方法得到了充分肯定,于 1923 年发表在齐鲁大学《齐鲁医刊》第 3 卷第 2 期上。此成果本想以于复新的名字投稿国外,他的老师美籍医生柯德仁((Dr.S.Cochran)怕外国不给刊登,遂以“柯-于”二氏之名发表在美国学术杂志上。“于氏试验”最大的优点是不易出现假阳性,对于一些不能开展瓦氏反应,只能做康氏反应的检验科,加作“于氏试验”能明显提高梅毒血清试验的准确度。“于氏试验”早于日本的井出氏环状反应,且比井出氏反应准确,但在讲课及工作中,于老一贯谦虚地把它称为“环状试验”而从不提及他的姓氏。

以后,于老又与他的学生共同发明了利用康氏抗原做凹玻片试验,以代替外国的克莱氏试验。这样,在齐大医院,每一份血标本要常规地做三个试验——康氏、于氏、凹玻片;如有怀疑则加做华氏反应。至于华氏反应,于老坚持用三个抗原的法国方法,而不采用一个抗原的美国方法,以保证结果的准确可靠。于老对工作认真负责由此可见一斑。

于氏梅毒血清试验的出现,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为我国检验界增添了光彩,1947 年,于复新教授又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梅毒螺旋体黑地映光检查法,大大提高了对梅毒病的诊断水平,因此对我国梅毒的防治和最终消灭梅毒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于教授被政府特聘为华东区皮肤花柳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于复新教授的名字也名扬医坛。

罄其所学 教书育人

于教授毕生从事临床检验工作,并热心培养医务人才,罄其所学教书育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即深感中文医学检验书籍的缺乏,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检验事业的发展,因此将他积累多年的资料和经验,汇编成《实验诊断学》一书,于 1929 年出版,贡献给检验界同仁。这是中国学者自编的第一部检验学专著。为培养我国自己的高级临床检验人才,他于 1930 年主办了我国最早的大专水平的检验技师班。济南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主任徐景唐、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施博之、史耕九教授等即毕业于该班。1949 年他在齐鲁大学又主办了一期检验专修科,新生有董仲甫、高秋生、殷丽明、徐文声、张温信等,从其它院系改学化验的有李灿珍、郝金城、

宫文芸、方静娴、王惠英；1950年插班生有唐子洵；还有早毕业于大专的老护士黄瑞云，因热爱化验工作也改学了这一行。这是于老一生中亲自教的学生最多的一个班，也是他亲授的最后一期检验大专班。此后1951-1952年，于老还亲自培养过一期进修生，1953年去西安讲学半年多，1958年在省卫生干校任过课，晚年还经常去医院检验科义务辅导。

于老一生治学严谨，检验大专班在校二年期间，两个寒假一个暑假只给14天假期，其余时间都用作实习。有一个同学暑假未实习，于老让他晚毕业两个月补实习。每逢学生出了差错，于老总是给以严格的批评指正。在学疟原虫的时候，每逢学生在血片上找到一个疟原虫，于老就要提问这是哪类疟，哪一期，雌性还是雄性，为什么？力求学生切实掌握。在学习阿米巴的时候，于老也是亲眼看着学生看显微镜，手把手地教。为了锻炼学生，于老常到门诊化验室搜集阳性标本。一次，他把几份大便混合在一起再分成许多份，编上号分给学生，向他们要化验结果，目的是培养学生识别阿米巴包囊的能力。班上有个别学生认为不需要再学外语，找于老提意见。于老当场拿外文书让他试读，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外语水平并不高，打消了不学外语的念头。于老患有心脏病，可为了培养检验人才，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学生有问题就去请教他，实习大夫遇到不认识的病变标本也常去请教他，他都热情地耐心给以答复和指导。

1937年于老又改版了他编著的《实验诊断学》行销国内。在解放战争时期，该书在于教授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华东解放军卫生部重印，在前言中作了说明，作为华东解放军检验人员的重要参考书。那时济南尚未解放，而于教授的专著却已在为解放战争服务了。

1948年济南即将解放，齐大医学院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策划南迁。于教授深明大义，毅然决定留在济南，和革命师生一起迎接解放。人民是不会忘记支援过解放战争和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的，1949年7月，于老应邀参加了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并担任筹备委员。1950年受聘为济南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华东区皮肤花柳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科普协会筹委会委员、济南麻风病院董事长等职务。

于教授不但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精湛的检验技术，因此先后受国家卫生部、华东卫生部、青岛海军医院、西安医学院附院等许多单位的邀请，去实地指导工作或帮助建立检验科，为提高重点医院的检验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于教授在解放后(1951-1958年)短短的九年中，编著了三本临床检验专著，其中两本是全国临床检验专业教材，共计120多万字(于复新：《实验诊断学》，195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全国医士专业教材；于复新、徐涛、田君藩：《临床检验》，

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为全国临床检验专业教材)。此外,他还先后在《齐鲁医刊》、《华东卫生》、《内科学报》、《中华皮肤科杂志》、《临床检验杂志》、《中华内科杂志》发表论文“梅毒血清环状试验”、“诊断梅毒血清各种方法之比较”、“梅毒反应的百分率及血型分类统计”、“单做康氏反应的缺点及其补救方法”、“乏色曼氏补体结合反应与康氏、环状两种沉淀反应之比较”、“梅毒的血清诊断问题”、“解放前与解放后济南梅毒血清阳性率的比较”等多篇,大大丰富、充实了临床实验诊断学的内容,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于复新教授堪称新中国临床检验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于教授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他组织和领导济南市检验界同仁,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亲手制备瓦氏抗原、康氏抗原和于氏抗原出售,以所得资金支援抗美援朝。解放后,他从历年来几万份梅毒血清检查结果中,看到解放后梅毒试验阳性者逐年减少、性病趋向消灭的光明前景,备感欣喜,便在中华内科杂志上著文,以实际数字颂扬人民政府拒绝娼业、根除性病这一德政。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响应政府拒绝娼业、根除性病的号召,把在老家的少量遗产卖了,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家乡人民政府,支援经济建设。

于老出身贫苦家庭,由于遇到不少好心人帮助,才一步步摆脱困境,走向辉煌。因此他也一贯感恩,决心回报社会,平时乐于帮助他人,十分慷慨。1949年他近60岁时,曾将自己300毫升血毫不犹豫地赠给一名急需输血而经济困难的患者。

1952年,上海医学检验界要出版《医学化验汇编》,邀请于老赐稿,本意是请他介绍有关识别阿米巴等医学原虫方面的经验。于老为他们加写了一篇有关化验人员医德修养的稿件,要人们工作认真仔细、精益求精。其实,于老提出重视医德医风修养,不仅对医学检验专业重要,对临床各科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于教授对他的学生充满爱护和提携之心,积极培养,鼎力相助,不遗余力。1957年他应国家卫生部的委托,主编《临床检验》全国教材,他让徐涛当他的助手,这不仅给徐涛以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也增强了徐涛的上进心和知名度。特别在稿酬的分配上,更显示了于教授大公无私乐以助人的美德。每次收到稿费通知单,于老都让徐涛拿了他的图章到银行去取,再让徐涛按每人撰写的字数分发稿费:于教授42.4%,徐涛45.6%,田君藩先生12%。这本教材是国家卫生部慕于教授之名而委托的,没有他这本书不可能摊到别人的名下,为此书于教授操心费力最多,论说至少他要多拿一份主编费,而他却分文不多取,其思想境界之高,令人敬佩。由于他是我国临床检验专业的奠基人,知名度高,对人热情、诚恳,因而全国慕名来学者颇多,如曾任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化验科副主任,后任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化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电镜、病毒专家、院士洪涛教授,都曾在其门下进修过。在济南解放初期,齐鲁大学医学院还归外国人经办,没有助学金制度,有些同学因经济困难,面临辍学困境。于

教授在青年时期曾有家贫而辍学的痛苦经历,对这些同学十分同情,当时他曾兼职管理医院营养室,便从他主管的伙食费利息中,提出部分资金帮助这些同学,使之能继续学习。当时被资助的有十多位学生,如张茂宏、刘丽思、唐子洵、赵玉田、吴兴闵、刘景祺、高秋生等,他们都成了新中国的高级人才。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于教授这一义举反被诬指为“贪污行为”,责令于老将救济学生的钱全部退赔。以后事情弄清楚了,证明于老是清白无瑕的,他对此事也毫无怨言,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他为自己做了一件应做的事情而怡然自得。

遗嘱超凡 闪闪发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迫离开了他义务技术指导的岗位,中断了他心爱的事业,这加重了他冠心病的病情。他预感到为人民服务的日子不多了,为防不测他毅然挥笔写下了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我死后先作尸检,如发现对科学研究或教学有用的组织,可留作标本,存山东医学院病理科使用,余体可以火化”。另一条是“除了火葬费外,不许浪费一文,火化时穿我平时穿的衣服,不许另做衣服……”一个来自旧社会、自学成才、长于外国人所办名牌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仅在生前能为建立我国临床检验事业而竭尽全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其即将与世诀别之际,在身处逆境受“四人帮”迫害之时,还把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倡导的节约美德铭记在心,还要把自己的遗体奉献给他所热爱的科学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是于教授思想的升华。他这种罄其所学教书育人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于复新教授是医学检验界的耆宿。他的一生是为医学科学事业艰辛奋斗的一生,在热爱本职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处世为人诸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